



球场不平

我的足球生涯

苏永舜 / 著

想当初，我是情非所愿，命难以违地踏入国家足球队，在足球圈闯荡了二十多年，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胜败荣辱，忧患中踩着崎岖之路，艰辛地奋发前行不敢停步。

到如今，我又情非所愿，情难以却地离开了国家足球队——我已全心眷恋的足球天地……

我惟愿我的离去，能摆脱足球生涯带给我的坎坷与崎岖！

惟愿我的离开亦能把厄运从中国足球队中带走。

苏永舜

长春出版社

球场不平

我的
足球
生涯

.....苏永舜/著

長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球场不平:我的足球生涯 / 苏永舜.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00.7

ISBN 7-80664-220-X

I. 球... II. 苏... III. 苏永舜-回忆录

IV. K825.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4163号

责任编辑:庄宝仁 赵宇鹤

装帧设计:庄宝仁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正泰印务公司制版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邮编130061 电话8569938)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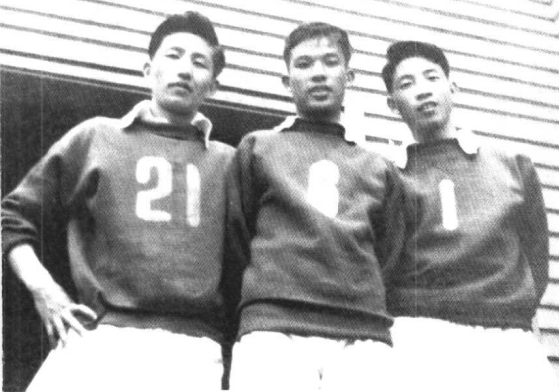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68千字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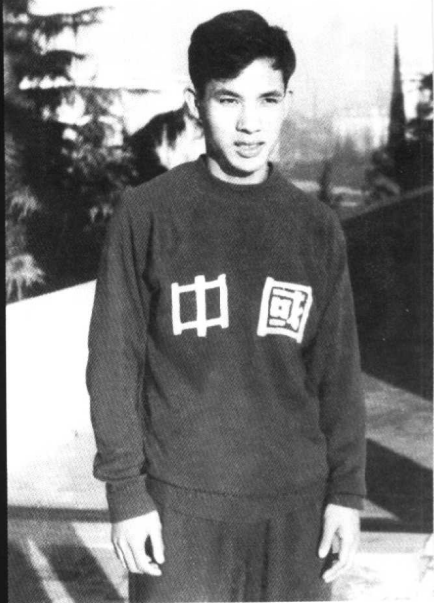
印数:20 000册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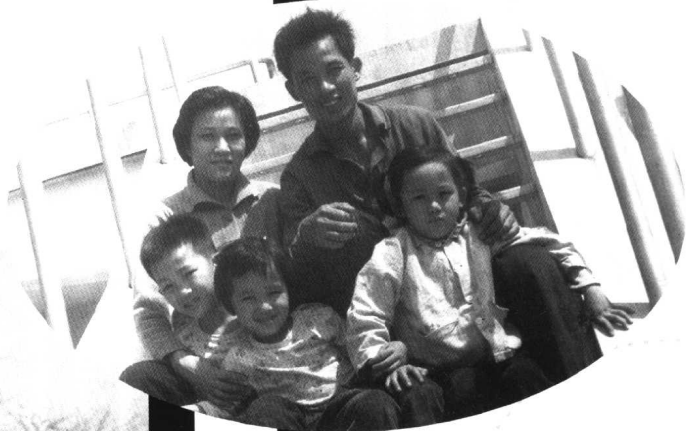


▲ 1953 年冬与陈成达、方纫秋合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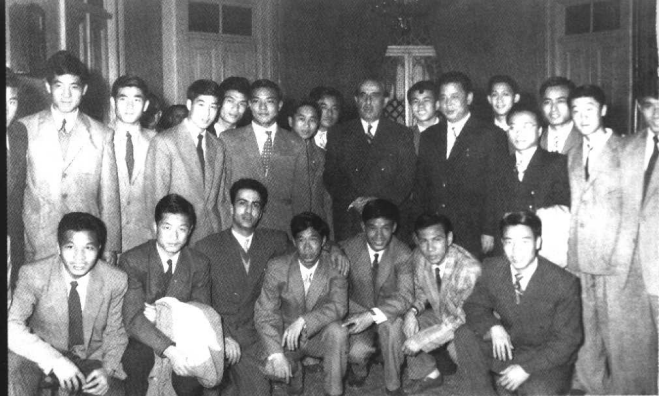
▲ 1956 年成为国家队的主力



▲ 教学示范于广州二沙头



▲ 走入“五七”干校前的一家五口



▲ 1958 年叙利亚总统在总统府接见后合影（前排右三）



▲ 1951 年中南区六省二市比赛获得冠军的广州市队（前排右四）



合影于总统府小礼堂（后排右四）
「马科斯夫人杯」赛后，受邀与马科斯夫人
▲ 1977 年，广东足球队参加第一届菲律宾宾

► 1978 年第一届省港杯赛, 广东队捧杯(前排右四)



◀ 1978 年赴原西德考察, 在杜伊斯堡与鲁迪教练商讨足球发展趋势(右二)

▼ 1979 年在香港与欧洲足球先生基岗在记者招待会上





▲ 1981 年在国家队任主教练期间



▲ 1981 年中国队战胜朝鲜队后全队合影（后排右一）



► 1982 年写就《坎坷的道路》一文



右六）
东足球大起大落的同行们（前排
▲ 1988 年在佛山与曾演经过厂

 策划·严俊君

 统筹·翟树言

 编辑·王国锋
伍少利

—— 球场不平

帅才难得

代序

严俊君 翟树言

来自人口超级大国——中国的国家足球队，在二十年来连续五次未果之后，如今在全球最负盛名的教练米卢蒂诺维奇指挥下，开始了第六次向世界杯进发的历程。

而在这五次冲击世界杯的历程中，最接近成功、最为悲壮的一次，就是苏永舜指挥的第一次冲击。苏永舜当年驾驶的世界杯战车，乘着容志行、李富胜等骁将，曾经翻山越水，一路披靡，驶达西班牙的“边界”。

今天，当米卢蒂诺维奇与中国球员又一次登上世界杯战车之际，苏永舜的思绪，也抑制不住回到二十年前，那段带领中国队历经坎坷、辉煌与沉痛的日子而难以平伏。

在那个弥漫着寒意的夜晚，他本已躺进广州家中温暖的被窝，观看电视直播的亚大区最后一场赛事。这场比赛远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积分居于老三的新西兰客场对垒老四地主队。在正常游戏规则下，两队的实力之差只在一两球之间，而客场取胜更是难上加难。当时，在亚大区四强决战中，科威特队已稳获出线权，而中国队则暂居第二，前两名将夺得进军西班牙的入场券。

虽然，他所带领的中国队不公平地比所有对手早两轮结束



赛事，但此时仍领先随后的新西兰3分另加5个净胜球（按：规程为胜2分平1分负0分）。不过他的球队早在两周前战事完毕，就已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静候来年兵发西班牙时日的来临。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越了正常的规律。在科威特主场与新西兰和气收场之后，作客沙特阿拉伯的新西兰人再“理智”地连灌主人五球，沙特阿拉伯国脚也不多不少“见好就收”，这样的结果既讨好了新西兰，又不过分得罪中国，更不敢明目张胆激怒国际足联，引火烧身。

但这五粒入球对苏永舜来说，却有如五雷轰顶，压得透不过气来。他只得被迫仓促跃马应战。

苏永舜的足球故事，跌宕起伏、命途崎岖、得而复失、反胜为败，应验了“球场不平”这句话，十分耐人寻味。

苏永舜带队能取得亚洲大洋洲最重要赛事的优异成绩，并非偶然。

看看他对多年来主导着中国足球训练理论的批判、看看他对执教广东队实践的回忆，就可知道他的成就决非碰巧，而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对足球奥秘大量与科学的了解基础之上。有一句古语叫做“行成于思毁于隳”。苏永舜的成功，主要也是靠“多思”换得来的。这当中，确实“隐藏着”他那与别人不同的“武林秘笈”。

苏永舜在书中公布了他当年执教成功的这份“秘笈”。

苏永舜以科学的态度检视分析了中外强队、强者的现象，指出个人的控带过人技术在比赛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他同时也指出了以往把传球和跑距作为球队训练指标的迷误，以及教练员、球员对“统计科研派”盲从的教训。

其实，苏永舜对足球训练应该注重个人控带技术的理论见解和建树，也不是什么秘密，多年来他本人一直是大声疾呼。无奈他的主张至今仍未受到中国足球领导层的重视和推崇。这无疑也是中国足坛几十年来最大的损失和憾事。

读过苏永舜的这篇回忆自述，就可以清楚了解他的技术型足球与领导层倡导的体力型足球有什么不同。同时也可以认知，为什么中国足球统一步调，苦搞了几十年，中国球员的个人技术素质，至今还是那么平庸。

纵观世界足球史，重技术派与重体力派不断对立与纠缠。双方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取长补短。这种现象，幅员广阔的中国足坛也不例外。

苏永舜可以称得上是国内倡导踢技术型足球的“掌门人”之一。

七十年代，苏永舜带领的广东足球队，鲜明地坚持注重个人控带技术、讲究短传配合、注重积极进攻以及灵巧多变的风格，成功地压倒了那些以体力为本钱、轻视“技术挂帅”的球队，使五、六十年代曾昙花一现的广东南派技术型足球在七、八十年代继续发扬光大，取得不少有益的经验。

苏永舜把这些成功经验升华为自己的足球理念：讲究技术、积极进攻、以我为主。

可惜，在中国足坛近四十多年来，“技术派”一直未能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未能及早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体力派”往往把对付国内（尚还稚嫩的）技术型球队的胜利，不恰当地夸大为足球比赛的普遍规律。与此同时，足球科研统计的“结论”，也有助于忽视技术、偏重体力观点的流行（统计表明，球员在90分钟赛事中，每人平均触球时间只有几分钟，据此

得出结论——球员应以跑和传的训练为主——不见得是科学的)。一时以体能训练为本的体力型足球大行其道，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足球技术型流派的发展，也制约了整个中国足球技术的进步。

当中国队在世界杯外围赛面临十几年从未战胜过的宿敌朝鲜队时，苏永舜决意把自己重技术、重进攻的理念付诸实践。以朝鲜队当时的威名，敢于以“进攻为主、以我为主”的方针对付他们，在亚洲没有几支球队有这个胆量。

朝鲜队崛起于世界足坛，最大特点是体力好、奔跑速度快。他们取胜的主要法宝是靠中前场的凶狠逼抢、简炼朴实的长短传快速推进，以及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技术尚欠精良的亚洲任何对手拼得腿软。

苏永舜客观地总结了中国队一些前任教练与朝鲜拼体力、拼防守的错误，敏锐地抓住了朝鲜队的可击之“懈”，他运用以往在广东队尝过的甜头，以精于个人技术及配合的灵活进攻，威慑对手，而且十分恰当地发挥了容志行、黄向东、杨玉敏等人的不同长处。应该说，这种正确估计球场形势的能力，以及敢于以攻对攻的胆量，不是嘴上夸夸其谈而实质平庸的教练可以做得到的。

苏永舜足球生涯的最大特点，是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在很多“权威”振振有词的时候，仍能冷静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而且时常执着地坚持自认为正确的见解。这虽然会使他时有命运的悲怆之感，但也终能为他带来胜利的甜头。

苏永舜能养成“多思”的习惯，与他的个人经历很有关系。

当初，他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被调入了专业足球队，对

他来说是进了“误区”。但当他后来无法抗拒组织安排，不能重返大学时，他只能下决心踢好足球。他的名言是“踢球不成三大害——害国、害家、害自己”，这成了他定要把球踢好的动力。他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苦练技术，因为他知道出身不可改变，只能靠改变自己的技术水平才有出路。

当他在1956年终于获得代表国家队出访机会时，他的激动溢于言表。那真是一次“三喜临门”：一喜从“政审”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二喜有资格代表国家队出国比赛；三喜自己终于打上了主力。

不过，在与东欧球队的较量中，他也体会到了技不如人、实力不如对手的无奈，这无疑给他的“三喜临门”泼上了一瓢冷水。对阿尔巴尼亚的访问，在这位大学生出身而未见过世面的足球运动员脑中，也留下了很多个“为什么”。他不明白被誉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为什么比我们还要穷……他不但为足球而感慨，也为各种社会现象感慨。

苏永舜的独立思考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有着这种精神，他才会不断地发现问题，才会敢于在足球的技术理论上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在他后来的足球生涯中，这种独立思考精神和能力，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苏永舜的独立思考精神和能力，很大程度来自于他的“逆境求生”环境。

正在广州中山大学就读的苏永舜，当年暑假接到一纸调令，赴天津加盟中国大学生足球队，准备去参加世界大学生比赛。原以为只是一次临时性质的愉快的“暑假之旅”，岂知后来不但球队的“世界大学生比赛”没有去成，苏永舜也由此被迫走上了足坛的“不归路”。

苏永舜的初衷并不是想成为“专业”的足球队员，他的志向是在高等学府的学术领域“攻城拔寨”。由于他在广州的业余足球（当时广州并无专业足球队）圈中出类拔萃，又在1953年的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令人瞩目，所以“有幸”被征调入中国大学生代表队。

这支中国大学生队在放弃了世界大学生比赛后，随即成为中央体训班足球队的一部分。这亦是当年国内为数不多的“官办”专业足球队之一（除中央体训班之外，当时尚有各大行政区和军队等“官办”专业队）。

苏永舜在热火朝天的“苏联老大哥模式”训练之中，被迫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但也由此展开了他“球场不平”的命运搏斗。

他所遇到的第一次“命运大挑战”，就是“留洋梦碎”。

属于前苏联东欧阵营的匈牙利，是当年首创“四前锋制”而大破足球鼻祖英格兰不败金身的足球“革命圣地”，拥有普希卡斯、柯启士等世界级巨星。苏、匈国家足球对中国年轻足球队员的吸引力之大，可想而知。为此，苏永舜积极修习俄语，准备出国学艺，对前途充满憧憬。

未料，当留学匈牙利的队伍出发时，他才知道自己已被淘汰出局。不言而喻，那时的“海外关系”和“家庭出身”问题，是使他成为不幸者的最大原因，虽然至今他并没有得到过明确的答案。其实，由于这种“问题”而被扭转了一生命运的“不幸者”，当时又何止苏永舜一人。

幸而苏永舜没有在命运的打击下自暴自弃。他选择了在逆境中奋发图强。苏永舜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改变既有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颜色，惟有在专业技能上努力求进，比别人更

胜一筹，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

他在李凤楼先生的教授下，勤学苦练多思，终于使自己掌握了并不逊色于留匈球员水平的足球技能。客观而论，那些当年没有留匈的球员，后来对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也都作出了同样的贡献。

顺便一提，“洋”、“土”两批球员经过近两年的分头学艺之后，虽然没有直接比个高低，但从不久后分别与南斯拉夫队比赛的结果看，两批球员的实力似乎没有显示出太大差距。苏永舜只是觉得，留匈球员的战术风格较为赏心悦目。不过苏永舜对“土法上马”的李凤楼更表钦佩，因为那是在毫无前人经验教训之下，完全靠李凤楼自己边做边摸索出来的。

也许，由于有过这样的经历，苏永舜后来一直并不迷信于外国足球专家的神话。他认为，对于中国足球，本国足球专家的能力，不会比外国足球专家的能力差。最具代表性的行动是，1992年他上书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直言国家队选用外国教练的弊端，同时希望自己能再次获得执教国家队的机会。他表示，以中国足球的现状而言，中国国家足球队水平能否提高，并不在于使用哪国专家，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问题只在于执教者能否抓到提高国家队水平的要害。这已是扯远了的话题。

苏永舜遇到的第二次“命运大挑战”，就是“滞留‘五七’干校”和“借调回球队”。“文革”期间，苏永舜因“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问题（他的父母、兄弟都在海外），政治生命“垂危”。又因陷于“偷渡”嫌疑，业务上也就归入不可重用之列。所以当干校结束、学员分配时，他被安排到广东云浮县硫铁矿接受改造。由于担心在工人阶级中成为少有的“阶级异己

分子”靶子，他被迫拒绝服从“分配”。他不但不敢奢想继续发挥自己的足球专长与才能，甚至宁愿放弃多年的国家工资待遇，与妻子儿女相依为命，回祖家种田务农。

可幸，在那个视人才如粪土的疯狂年代，仍然有人敢于视才如金。

广东省体育界领导人巧妙的一纸“借调”，保住了苏永舜身上的足球才气。而在当年的环境之下，这一“借”显示了主事者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

而对苏永舜来说，作为被临时“借”用的教练，他除了把球队水平带往更高处之外，根本不可能再有第二条出路。但他认为广东队要想超过当年“大起”年代的水平，靠从现有的老队员身上挖潜力已不可行，但年轻的队员又太“嫩”。当时的难题是，有条件要上，无条件也要上。他只能挑选几个有潜质的年轻球员，加班加点苦练他们的个人“控带接转”技术，以此带动各种技术和整体水平的提高。幸运的是，他的学生何佳、陈熙荣、襁洁球、关志锐、欧伟庭等人，通过一段时间的加班苦练，技术大有提高。由此更坚定了苏要在沈阳集训教学比赛中大量起用新人，实施“以老带新、以新换老、以新为主、立足未来”的方针。

但是一连串的不佳战绩，引起一位主管足球的省体委副主任责难。体工队总部也发来了“你们还要不要‘广东’这两字”的警告。

足球如果背负了球场以外自身承受不了的太多使命，就变成一种沉重任务而不是“快乐游戏”。苏永舜感叹他的上司“疑我用我、用我还疑”。就连他的从不关心足球的妻子，也闻到了他在沈阳集训“孤注一掷”用新人所带来的“引火烧身”

危机的火药味。

面对如此“逆境”，苏永舜坚定不移把他对足球的理解“贯彻”下去，终以不俗的人才输送成绩，化坎坷为坦途。

苏永舜敢于坚定地相信自己对足球的理解，也得益于他平时对外界足球资讯强烈的求知欲和敏锐性。

作为有上进心的足球教练员，苏永舜对掌握世界足坛风云变幻，心情自然十分迫切。但他当年所处的却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他的“海外关系”并没有为他带来更广阔的视野。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他，也一直苦于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足球训练学习资讯。而他所能找到的资料，只有体委科研部门从前苏联报刊杂志上翻译的文章。他发现前苏联专家们却崇拜西欧、南美的足球技术，因为那才代表着世界先进水平。

苏永舜的学生家长“大树”（襁洁球的父亲襁辉泉），成全了他想了解世界一流足球动态的愿望，向他提供了一批在香港出版的中文版《英国足球》、《足球世界》杂志。

这些杂志成为了苏永舜自我提高现代足球理论学识水平的必修读物。换言之，通过对世界足坛动态的了解，苏永舜在重新回到广东队执教时，是以一种紧追世界先进足球理论为自己实践依据的。

通过对世界先进足球动态的了解，具有深厚文化教育底蕴的苏永舜，悟出一句对中国足球状况批评的真知灼见——“足球运动是一项非常富有战术性的集体项目，讲究集体的合作是必要的，只是我们太忽略了整体中每一个分子的质量，因而便完全失去了整体的质量。”

苏永舜为当年的个人技术“才子”张宏根得不到应得的推崇而惋惜；又以自己从前的队友金昌吉为例，说明了个人技术